南梁精神揭示了什么？孕育形成的历史

□ 王志民

87年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团结带领陕甘边区军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不断发展壮大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为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孕育形成了南梁精神，这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政治资源。

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历史

南梁精神，是在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坚持党的领导，团结带领陕甘边区军民，不断进行配合、联合、整合的历史实践中孕育形成的。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陕甘边区共产党人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以“只知有党，不知有其身”的忠诚品格，坚决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确保陕甘红旗不倒、革命根据地屹立不败。

1934年7月，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的红军部队和谢子长等率领的陕北游击队会合后，自觉联合，统一决策，并派红26军主力北上，支援陕北革命斗争。1935年初，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红27军成立后，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实行统一指挥领导，互相支援配合，形成统一而强大的陕甘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后，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无端指责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对此，刘志丹、习仲勋等坚持以大局为重，始终保持着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革命品质，即便是在党内遭受不公正待遇，仍然以正确方式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守护了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面对王明等严重干扰党中央抗日战争正确方针贯彻执行的错误行径，习仲勋等始终坚决维护党的领导，一切服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挥，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就是对这种精神的高度肯定。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性运用强大真理武器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

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团结带领陕甘边区军民，坚决抵制错误思想干扰，坚定走毛泽东开创的中国革命道路，紧密结合当地革命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解决和处理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他们既坚持实事求是，又勇于开拓创新，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创建新型革命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为党在全国执政进行了先期探索。

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难过程中，陕甘边区共产党人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和环境艰苦的陕甘两省交界山区建立根据地；将群众工作与统一战线相结合，不拘泥于工农群众的概念限制，灵活争取民团、土匪、哥老会、国民党军队及少数民族群众，扩大革命联盟，为党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供了借鉴；创造性形成红、灰、白“三色”建军思想，最大限度争取和壮大革命力量；探索形成多区域战略布局，灵活机动地实施敌进我退、外线作战的战略战术，使根据地在流动中生存发展。毛泽东赞赏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谢子长在陕北面临白色恐怖和部队严重受挫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创新机动灵活的战术战法，取得了粉碎“围剿”、两破安定城、消灭“四大民团”等胜利，巩固并发展了根据地。习仲勋坚持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领导制定了全面系统的“十大政策”，丰富了党局部执政的理论与实践。

坚决践行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历史

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时刻牢记党的性质宗旨，与陕甘边区人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坚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真心关心群众，通过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发展经济、兴办教育、改善医疗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切实维护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改善了人民生活，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为开创革命新局面提供了坚强保证。

刘志丹视人民如父母，时时处处替人民大众着想，要求部队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使战斗行军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打扰群众，不给群众添任何负担。被当地人称为“谢青天”的谢子长，战斗负伤、积劳成疾，去世前还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习仲勋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由于血肉相连，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人民群众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红军，腾房间、筹军粮、当向导、探敌情、踊跃参军。这种水乳交融、血肉相连、鱼水相存的党群、军群、政群关系，正是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边区政权、开展武装斗争中明显优势之所在。毛泽东曾评价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评价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敢于胜利的历史

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革命陷入低谷的艰难形势下，愈挫愈勇，屡失屡建，艰难曲折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他们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国民党军阀的残酷“围剿”、与上级联系不畅、革命力量鱼龙混杂、党组织不成熟不健全等困难，始终坚守理想信念，英勇杀敌、视死如归，坚贞不屈、斗志昂扬，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刘志丹在入党誓言中写道：“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他的好几位亲属被敌人杀害，两个幼子在恶劣战时环境中不幸夭折，自己也含冤入狱，但在生死关头，他始终坚信：“黑云总遮不住太阳”。谢子长在1934年8月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围剿”根据地的关键时刻，本应好好休养的他，怀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坚持随军转移和指挥战斗，随着伤情不断恶化，不久便与世长辞。习仲勋在革命处于低潮、身陷囹圄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出生入死、百折不挠，是始终怀抱“最大的牺牲决心”“为党尽忠”的坚定革命者。南梁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600多名烈士的名字，而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牺牲的革命志士远远不止这些。正是这些有名和无名的英雄们，在后人心中筑起一座永远屹立不倒的丰碑。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正部长级）〕

解放大西北最关键最激烈的战略决战

——兰州市华林坪革命烈士纪念塔碑文敬读

□ 赵前前

在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华林坪以南、沈家岭北麓的兰州市烈士陵园内，高高矗立着兰州市华林坪革命烈士纪念塔。纪念塔由鎏金五星、碑身和基座构成，塔身总高30.23米，塔座占地面积25平方米，基座呈五角形，镶有五块汉白玉雕花题词碑。塔身正面刻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纪念塔东西两侧是以“红旗漫卷西风、一切为了前线”为主题的两组大型浮雕。

纪念塔由五面组成，其中，东南面碑文为甘肃省兰州市人民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委员会题词：**“向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致敬”**；东北面碑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题词：**“烈士英名 万古长存”**；西北面碑文为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甘肃省人民委员会题词：**“永垂不朽 浩气长存”**；西南面碑文为中国共产党兰州市委员会题词：**“忆先烈鼓足干劲 慰英灵力争上游”**。

正北面碑文为《兰州解放记略》：

一九四九年秋，我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奉党中央之命，受人民之托，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挥师向祖国大西北挺进，先经扶眉战役全歼胡宗南匪军四个军，次经固关战斗、再歼马步芳匪军一个师，为解放兰州初奏凯歌。自此，敌军闻风丧胆，节节败退，我军乘胜追击，直趋兰州。于八月二十日，对盘踞兰州之马步芳匪军形成强大包围。二十四日，我军分东西南三路向敌攻击，经浴血苦战，反复争夺于二十五日攻克敌军主要阵地沈家岭、营盘岭、马家山，并连夜乘胜向市区发起总攻，神速控制黄河铁桥，截断敌军退路。二十六日晨十时，战斗结束，全歼马匪主力，兰州宣告解放，整个西北之解放亦由此奠定基础。在兰州战役中，我军前赴后继，奋勇争先，许多同志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其丰功伟绩永垂不朽，丹心碧血，辉映共产主义世界万年无疆。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　立

寥寥几百字的碑文回顾了1949年秋我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与敌血战、解放兰州的壮举，阐述了立碑纪念的历史背景，艰难历程和伟大意义。

奠定整个西北解放的基础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为东西南北交通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为保住西南四省，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召开西北联防会议，拟制了兰州决战计划，企图以甘肃马步芳部、宁夏马鸿逵部和陕南陇南胡宗南部挫败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外围。8月5日，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发出解放大西北的政治动员令：“我军决乘胜追击，直捣匪军巢穴——兰州，西宁，宁夏”。从战役发生到8月26日结束，兰州城区守军被全部肃清。兰州解放后，我军乘胜相继解放民和、化隆，直捣西宁。9月5日第1兵团解放西宁，9月中旬青海省全境解放。兰州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在西北战斗力最强、反共最坚决的马步芳主力2.7万余人，打通了进军青海、宁夏和河西走廊的门户，使国民党在甘、宁、青、新的各级政权彻底消失，为彻底解放西北五省奠定了基础。

在西北战场进行的战略决战

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上，兰州战役持续时间长、战斗范围广，从沈家岭战斗、狗娃山战斗、窦家山战斗到营盘岭战斗，发生的恶战前所未有。8月23日凌晨5时狗娃山战斗打响。七八百敌人上山偷袭二十八团三营阵地，排长张保英组织全排拼死抵抗，全团迅速投入战斗。至25日，随着沈家岭被攻克，二十八团战士顺势反攻，将敌人全部赶下了狗娃山。25日凌晨5时沈家岭战斗打响，第四军十师三十一团和敌军恶战，伤亡惨重，全团只剩下不足300人，他们重新编并战斗单位，以顽强的斗志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中午三十团前来增援，下午6时完全占领沈家岭。25日12时半窦家山战斗打响，第六十三军占领敌人3个阵地，敌军调集机动兵力，组织敢死队、督战队、执法队驱赶士兵进行反攻，并利用诵经宣誓、重金收买等手段促使官兵与解放军拼命。战士们和敌人展开肉搏战，连续打退敌军6次大反扑，最终夺取了窦家山。25日凌晨营盘岭战斗打响，我军2个团分别在营盘岭第一道峭壁及营盘岭东南与敌人展开生死搏斗，最终夺取了胜利。兰州战役是我第一野战军同西北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展开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是解放大西北中最关键、最激烈的战略决战。

彰显我们党、解放军和人民群众的英雄气概

兰州战役能够取得伟大胜利，离不开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离不开第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和在前线机动灵活的组织指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兰州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兰州战役能够取得伟大胜利，还离不开人民军队的舍生忘死、浴血奋战。在攻兰战斗中，我军广大指战员万众一心，前赴后继，英勇顽强，视死如归；许多营团干部始终冲杀在第一线，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气概和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战斗中，第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第三十团政委李锡贵、第三十二团副团长马克忠壮烈牺牲。战斗英雄陈全魁把2个手榴弹捆在一起，连续投出30对，自己身负重伤仍不下火线。某部七连指导员曹德荣身负重伤仍身贴崖壁手托炸药包，牺牲自己为第六军攻占三营子阵地和皋兰山主峰营盘岭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兰州战役取得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在贺龙、习仲勋等精心筹划和组织下，解放区先后动员民工700万人，筹备大车约100万辆，牲畜200万头，各种小车不计其数。在兰州战役中，仅从山西、陕北、陇东等地区就动员了15万群众一路保障，相当于当时兰州市的总人口。彭德怀感慨地说：“如果没有西北群众的支前参战，我们要想取得胜利，做梦也是梦不到的！”兰州战役在解放大西北的历史地位永载史册，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的英雄气概名垂青史。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艾思奇：善用大众话语的人民哲学家

□ 吴荣生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月在云南考察时，专程来到位于腾冲和顺古镇深处的艾思奇纪念馆。在这里，他对艾思奇予以高度评价，指出，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样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这就是艾思奇同志给我们的启示。

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堪称“奇书”：成书于上世纪30年代，出版不到5个月就4次再版，短短10多年创下连续出32版。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各地发行的版本已达75版，至今总版本数量超过90版，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奇迹。《大众哲学》用大众话语阐释哲学本质，让哲学回归生活，是一本“把哲学还给民众”的通俗读物。因此，艾思奇也被赞誉为“人民的哲学家”。

“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3月2日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艾思奇”是他在上海时使用的笔名。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于缅甸加入同盟会，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艾思奇兄弟姐妹五个，他排行老二，大哥学生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父兄的影响和家庭氛围的熏陶，艾思奇自幼具备强烈的革命意识和爱国精神。

中学时期，艾思奇加入了学校成立的青年读书努力会，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新青年》《向导》等杂志让他眼前一亮，15岁的艾思奇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曾对自己的朋友陆万美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感到豁然开朗，对整个的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1927年，在艾思奇探望他的大哥时，被正在抓捕学生运动负责人的北洋军阀抓住并投入监狱。年仅17岁的艾思奇在狱中因思想进步，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判处死刑。幸亏父亲和大哥多方奔走，艾思奇才被保释出狱。

留学日本期间，艾思奇阅读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日译版本，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为他以后专攻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艾思奇的一生留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著作，连续出版《新哲学论集》《哲学与生活》等著作，还著有《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及有关哲学论著多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曾评价他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一卷书雄百万兵”

“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这是艾思奇纪念馆的一首诗，出自蒋介石和蒋经国的高级幕僚马璧之手。就连蒋介石在溃败台湾后，也将《大众哲学》放在案头时常翻阅，还要求蒋经国也要读。蒋介石在反思失败的原因时，曾感叹道：“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

一本《大众哲学》何以抵过百万兵？1934年，《申报》开设了《读书问答》副刊，艾思奇负责其中的“哲学讲话”专栏，以读者问答或驳论的形式，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为了尽可能地贴近大众，年仅24岁的艾思奇开始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例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连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种现实问题。1935年，备受关注的“哲学讲话”专栏以《哲学讲话》为书名结集出版。后经修订，改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发行量一增再增。这本书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并遭到查禁。一个负责查书的国民党官员甚至无可奈何地说：“就那么一本书，弄得那些青年神魂颠倒，搞得我们坐卧不安，毫无办法！”

科学真理只有接近大众、走进大众并为大众所掌握，才能真正成为大众“批判的武器”，变成“物质力量”。当时的中国时局动荡复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价值尤为珍贵。在《大众哲学》中，艾思奇以大众需求为导向，以大众话语为载体，大胆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之道。他用大众话语承载哲学道理，将深奥抽象的哲学理论以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予以表达，迅速圈粉无数。正如艾思奇自己所言：“我写《大众哲学》，不是为了那些富家子弟为他们提供好看的衣裳，而是为贫穷的百姓提供一个烧饼。”

《大众哲学》中的大众话语直接满足了当时人们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朴实愿望，切实推动哲学回归大众，帮助大众认识进而认可马克思主义，启蒙了成千上万青年人的革命理想。老一辈革命家宋平在回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往事时，提到最早就是受了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影响，“这本书将深刻的哲理寓于生动的事例之中，通俗易懂，使我从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

为《大众哲学》作序的李公朴，给予了这本书高度评价：“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这既概括了《大众哲学》一书的鲜明特点，又提炼了艾思奇为大众书写哲学的人民情怀。他用通俗化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真正做到用大众话语向大众讲哲学。他用形象化比喻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抽象的文字表述转喻为直观感受的形象，拉近了大众与理论的距离。他用生活化的举例支撑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既便于大众认知理解，更利于大众记忆运用。

艾思奇的哲学话语风格使其与人民大众产生了思想共鸣，毛泽东称赞《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艾思奇用大众话语承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此后，毛泽东也越来越多地用生动的话语和鲜活的事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如在解释事物的变化发展时，毛泽东就借用了《大众哲学》中提到的“鸡蛋孵化成小鸡”的例子。